

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二十六辑)

总主编 / 李玉明

清官典范于成龙

张秋怀 著



于成龙在康熙年间从地方小官做到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，始终奉行儒家仁政之道，视民如伤，宽刑慎杀，廉洁自律，苦节劲操，博得康熙帝“天下廉吏第一”的赞誉。他虽为封建官僚的一员，但能有这样的从政品德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，称得上是古代清官的典范。

责任编辑:刘冬梅

张 熔

复 审:余超英

终 审:王灵善

山西历史文化丛书(第26辑)

清官典范于成龙

张秋怀 著

*

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—4922123

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6 字数:300千字

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(套)

*

ISBN 978—7—900434—80—7
G·110 定价:(全套10册)30.00元

《山西历史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顾问：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
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

主任委员：李玉明

委员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玉山	马志超	于贵卿	于崇良	王克林
王志超	王宝库	王灵善	王振芳	王家壁
牛崇辉	田中仁	冯素梅	任茂棠	刘 巩
刘在文	刘纬毅	刘振华	刘晓丽	成葆德
齐荣晋	李元庆	李东福	李锐锋	吴广隆
宋丽莉	杨二怀	杨子荣	杨建峰	张国祥
张捷夫	张鸿仁	罗广德	陈长禄	胡存悌
钟声扬	赵曙光	郑建国	降大任	郭士星
郭双威	郭维明	高 可	高专诚	陶正刚
柴泽俊	秦海轩	梁俊明	谢 恺	董永刚
董占锁	董瑞山	楚 刃	雷忠勤	霍润德

目 录

引子	(1)
一、罗城除弊兴利	(2)
二、合州惩恶劝耕	(6)
三、湖北呕血抚民	(10)
四、福建严整吏风	(19)
五、直隶饬查劣员	(26)
六、两江砥柱中流	(36)
七、清名百世流芳	(43)

天，故罗城的故事无人问，县城逐渐沦为废墟。

面对如此现状，未满二十岁的于成龙慢慢成长。他深入民间，遍访民瘼，为百姓办大事，赢得了罗城吏民的信任。苍天有眼，在继子任的第二年春天，风调雨顺，届期，他亲自来朝。明朝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八月二十七日，山西永宁州来堡村（今方山县下昔乡来堡村）一户于姓富裕人家喜添贵子，取名成龙，大概寓有望子成龙的用意吧。在父亲于时煌的潜心教诲下，于成龙从小就苦读古代经史典籍。他读书领悟力强，善于抓住精神实质。童齿未退的他，已出惊人之语：“经史子集千本万卷，无非仁义礼智四字而已。”“仁义礼智”成为后来他人生的箴言。

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于成龙举为副榜贡生。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十月，山西被清军占领。于家生计日艰，于成龙忙于养家糊口，无暇应付科考，直到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才一举中第，被授为广西罗城县令。罗城偏处荒僻边陲，蛮烟瘴气，人迹稀少，北方人到此地，因水土不服，“百不一归”，故亲朋好友力劝于成龙缴凭罢任。他说：“荒芜之地，皆国家之土。人生仕宦，岂有择险趋易哉？”在他的坚持下，家人只得卖房典地，好不容易为他凑足了盘缠。临行前，于成龙嘱咐儿子道：“廷翼我儿，我做官在外不管你，你治家在里莫想我。”说罢，骑驴登程，首途南下，随行的只有仆从5人。

从此，于成龙踏上了荆棘遍地的仕途。

一、罗城除弊兴利

山西永宁至广西罗城，近万里之遥，一路南行，举步维艰。于成龙行至桂林，连累带病，已瘦得脱了人形，谒见上台，接待者见之无不咋舌惊讶。于成龙拖着病体来到罗城，入境观望，更是叫他倒吸了一口凉气：举目只见房倒屋塌，蒿草遍地，整个县城只剩了6户人家，还是老弱病残，蜗居于草屋柴门中。

当天夜里，主仆6人就住在县城破败不堪的关帝庙中。于成龙不禁长吁短叹，夜不能寐。几名仆人一齐劝主人趁早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于成龙沉思良久，说道：“古人云，见利勿趋，见害勿避。我今既以身许国，当如载民之船，岂有将民溺于流而自身靠岸之理？”于是他振作精神，插蒿棘为门，垒土砾为案，不分昼夜，开始扶病理事，当起这里的父母官。不久，5名仆人病死两名，溜走两名，只剩下濒于绝境的于成龙和老仆苏朝卿二人。

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调查，于成龙终于找到了罗城破败的根由：一是这里自然灾害连年不断，大小官吏敲骨吸髓，欺压百姓，致使山野间饿殍遍地，流民无数，有的藏于深山，有的索性落草为寇，扰乱治安；二是战乱频仍，罗城屡屡成为战场，当地百姓不是被征丁、征夫，就是被抢掠杀害，为了逃命，平民只有四处流亡；三是瘟疫流行，致使劳力丧失，田园荒芜，百姓只能“倚岩谷避难”，而原任知县早已逃之夭

夭，故罗城的政事无人过问，县城逐渐沦为废墟。

面对如此现状，于成龙只能一步一步慢慢设法。他深入民间，遍访民瘼，为百姓办实事，赢得了罗城吏民的信任。苍天有眼，在他上任的第二年春天，风调雨顺。届时，他亲自来到乡村扶犁耕田，与农民笑语相慰，极力鼓励，以致“民知公来，皆率妇子环公罗拜，或坐树下，与饮食笑话，欢如家人”。（见陈廷敬《于清端公传》）

与此同时，于成龙不失时机，采取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有效措施。

首先是编置保甲，建立乡勇。规定除乡勇外，平民一律不准携带刀枪。对于拦路抢劫杀人的盗匪，严查缉拿，当即处死，而对改邪归正者，则既往不咎，劝其从善。为进剿扰害罗城的邻县盗贼，于成龙身先士卒，率领乡勇生擒贼首，讨还了所掠的人口财物。自此，罗城社会治安逐步开始稳定，百姓有了良好的生活环境，人口渐渐增多，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。

接着，力除弊政，改革陋规。明朝统治者对广西实行民族压迫政策，利用盐、铁的垄断剥削少数民族人民。住在深山老林中的罗城百姓，更是难以尝到盐的滋味，往往以拥有食盐的多寡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志。为此，于成龙多次向布政使金光祖请求，采取“区划户口食盐法”，并呈《条陈引盐利弊议》，大胆提出禁官运、革埠商、便流商三项革除积年弊政的建议。经金光祖允许，这些建议在罗城县内实施，于是缩小了中间环节的盘剥，大大降低了食盐的成本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，同时也调动了盐商的积极性，促进了罗城的经济发展。

展。于成龙又针对大批官吏寄生于苛收田赋的现状，力主赋税征收应从实际出发，不可加重百姓负担。每逢收田赋时，于成龙都要亲自坐在堂上，张榜公布每户应缴赋税的项目、数量，座右则放置公平秤，任缴赋人自称自算。这样一来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，越发努力耕耘。于成龙乘势以“勤而获者旌其门，惰而荒者群言以辱之”等方式，奖勤罚懒，鼓励民众从事劳动，发展生产，改善生活。这样坚持下去，数年之内，流落在外的罗城人闻讯，便纷纷返回故土，广垦田亩，重建家园，以致昔日荒芜的罗城终于面貌改观，出现“禾穗被野，牛羊满山”的兴旺景象。

其三是，创建学馆，推行教化。罗城是一个以仫佬人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区域。仫佬人有自己民族的语言，但没有民族文字，文化欠发达。于成龙为实现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理想，从有限的赋税收入中挤出银子修建孔庙，设立养济院，自己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任学馆教谕，广招民家子弟，宣讲“礼义廉耻”的儒家学说，并规定凡读书应举者可免除三年徭役。他还引导民众改进民风民俗，使婚丧制度礼仪化、节俭化。这样，仅仅教化了三年，当地便形成了知礼仪、讲礼貌，“民俗和辑”的风气。

其四是，加强法制教育，普及法律常识。在教民以礼的基础上，于成龙着力把法律常识普及到民众之中，并在执法的过程中铁面无私地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、严肃性，使罗城百姓养成耻于犯法，循蹈于法，信服于法的习惯。由于长期的积习传承，罗城一向民风强悍，乡民倘有一事不和，往往聚众械斗，结果便是两败俱伤，彼此结仇。于成龙一面对械

斗者耐心调解训谕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一面细勘落实，查明是非曲直，立即判案，严惩挑起械斗者，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械斗恶俗的蔓延。他曾有一篇审械斗案的判言，洋洋洒洒，累及千言，以至诚恻怛之词，尽教诲劝诱之道，句句有骨，字字入理，道德文章俱佳，被后人誉为清代判牍中绝无仅有的典范文章。

于成龙在罗城7年，办案无数，始终如一地秉承天理良心，“不以温饱为志，只要理，不要钱”。其中胡安之一案，给罗城民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那是于成龙刚到罗城不久时，召用了一个办理文书的小吏，名叫胡安之。此人看上去忠厚老实，行事稳重，谨慎勤劳，治事不苟，在众小吏中如鹤立鸡群，深得于成龙信任。谁知他两面三刀，一出衙门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四处招摇，欺诈百姓。人们大都碍着于成龙的面子，能忍则忍。而一位叫严从龙的生员却按捺不住，站出来仗义执言，投票控告，且措词严厉，直指于成龙养奸宿蠹。于成龙阅禀后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在批示中深深引咎自责，并立即将胡安之拘押审办。于成龙就是如此执法不徇私情，体察民意。他志行修洁，固守清俭，率先垂范，感召吏民，不仅当时被上司金光祖荐举为卓异，而且清名流芳，为民拥戴。据知，罗城凤凰山下有一棵枝干粗壮的古榕树，相传为于成龙亲手所植，受到后世历代罗城人的精心呵护，至今枝繁叶茂，足见于成龙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和深刻影响。

二、合州惩恶劝耕

康熙六年(1667年),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。他在罗城为官7年,生活非常清俭,离任时竟连路费也凑不足,还是靠了一位善星卜之术的眇者一路热心资助,他才得以抵达合州。临行之时,罗城人恋恋不舍,遮道呼号:“公今去,我侪无天矣!”民众扶老携幼,追送达数百里。

清朝初年的合州管辖着铜梁、大足、武胜三县,涪江、嘉陵江、渠江三江在州内汇合而过。自古以来,这里本是膏腴之地,然而,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纷扰,此时的合州战后萧条,已是十室九空,遗民百余,州中财政收入田赋、丁银合计只有14两。于成龙沿途所见,尽是荒草丛生之地,鸠形鹄面之人。他不禁感慨系之,悲从中来,长叹道:“此又一罗城矣!”

上任伊始,于成龙就发现,他的慨叹实际上还过于乐观了一些,因为在某些方面,合州还不如罗城!罗城地处偏僻,土瘠民贫,上司无人问津,需索有限,而合州地肥物丰,水陆纵横,连年以来,上司频频敛财索物,民众穷于应付,州官头疼不已。这不,于成龙知州官椅还没坐热,就接到知府衙门索鱼小帖。于成龙愤然回柬曰:“民脂膏竭矣,无怜而问者,顾反乃索鱼,且安所得鱼?”他随即上书备陈合州荒残困苦的状况,并提出革除各种宿弊十余项的建议,认为应以“招抚百姓为急务”,招徕流民,使之安居乐业;对于归入清廷版

图的州民，使其和睦相处；同时大力奖励开垦荒田；改变民风民俗；优抚孤儿寡母。

知府为于成龙的亲民恤民主张及真知灼见的施政见解所感动，不但未加责备，反而转向支持他的建议。于是，于成龙首先从廉政抓起，规定凡上司到合州，一律不设宴，只以温饱为限，他自己下到属县也同样待遇。又裁去开支浩大的州府“仪仗队”，只买了一匹已不能干活的老马当坐骑，出衙时一仆相随而已。同时，他深入调查，全面规划耕田庐舍，鼓励流民落户垦殖，贷以耕牛和种子，并建立档案，使开垦者的“田业可恃为已有”，一改过去流民力役垦田，熟田却落入土豪手中的不合理现象，而且凡愿意到合州垦荒居住者，均免征三年徭役和田赋。结果，此令一下，一月之内，合州就新增居民千余户，出现了户户有炊烟、村村闻鸡鸣的一片生机。

不过，随着人口的增加，新的矛盾也产生了。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，专打外来流民的主意。就在人家辛勤耕作即将收获的时候，他们找借口强行霸占民众新垦的农田，或妄称此田为自家祖田，或反咬新户占了自家已插过标志的地亩。更有甚者，将新户修葺一新的空宅说成是自家的祖宅，新户想入住，就得交纳租赁费，否则便强行把新户扫地出门。

为彻底杜绝抢霸之风，于成龙一方面查实案情，严惩首恶，并把罪状在牌子上一一写明，挂在那些恶霸脖子上，鸣锣游街。在依法惩恶的威慑下，那些地痞流氓个个闻风丧胆，不敢再胡作非为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命人将“开垦之田，属开垦者所有；插标修葺之宅，属修葺者所有”等条款刻在路

边的好多大石上，公之于众，使过路者争相传言，全州人人知晓。这样一来，便有效地煞住了霸地霸宅的祸民风。房风
霸风在合州，于成龙还做了一件永载史册的事。武深武

明清时期，皇城屡屡大兴土木，如修建故宫，其所需木材，大都采自川、广、云、贵等地。合州林木蓊郁，盛产楠木，自然在劫难逃。为替皇宫采伐楠木，派遣的民夫往往是入山时3000人，到出山时仅余300人，民众苦不堪言。就在于成龙到合州的第二年十一月，接到了四川巡抚的旨令，命他火速前往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武隆、彭水一带采办楠木，并强调此役事关“钦工”，法在必行，还鼓励他“若著勤劳，定当特荐”，即办好皇差，保他升官。且而，某项职合不就中毛奏上

于成龙承令后沉思良久，愤然提笔疾书，一气呵成一篇《采楠木详》。书中云：“今岁灾情迭见，天变异常，邸报不绝。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惊忧遐方。庙堂之上，曾无一朝阳鸣凤，此成龙之所大惧也。蜀川素产楠木，列朝已有成案。今日之蜀州，非昔日全盛可比，田地荒芜，烟火绝灭，赋役户口载在由单，历历可数。即有一二孑遗，惊魂未定，尚望安辑。抚育之不遑，忽遭此大役，谁为采办？谁为幸运？哀此残疆，势必官与民皆死！从此流民裹足，居民惊散，可惜蜀川财赋之乡，终为空虚之地。”他又以自己从广西到合州途中亲眼所见陈述：“大箐之中云树参天，日光不到。即夏秋之交，尚有冷气逼人，当此寒冬凛冽，竟成冰灾。大树之中，林薄叶密，藤萝缠结，虎豹成群，人迹罕至，必须斩伐开径为容人之路，火炮刀枪防猛兽之奔逸。且蜀中居民与他省不同，平日即乏皮袄，又无絮衣，驱此啼饥号寒之众，修深山密箐之路，

无衣无食，何以御寒？必致冷冻颠扑，一虑也；倘有一二颠扑，四处居民闻风奔窜，是工尚未举而地方已为骚动，二虑也；隆冬天气，民徒无依，相聚为奸，是目前所必无之事，亦古来所恒见之事，意外可虞也。”（见《于清端公政书》）鉴此，他提出了新办法，即可由文官衙役负责修路的一应工具，武官兵丁携带防御野兽的武器和露宿山林的帐篷，全班人马驻山伐木，以赶工期，如此便“可不用民间一夫，而地方安静无惊”。

《采楠木详》言辞恳切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于成龙体恤民情的一片赤诚，地方巡抚读罢十分认同，遂批准照办。于成龙当即带了五名随从前往考查，将山形地势熟记于心。腊月，他未动用一民一夫，自己亲率兵丁衙役入山采木。为赶工期，他除夕之夜仍在山上，宿于破庙之中。此时，想到几年未曾返乡与家人团聚，不禁思绪滚滚，百感交集，作《戊申除夕》，诗云：

驱驰王事入彭川，旅舍神宫辞旧年。
七载罗阳梅弄影，三冬蜀道柳含烟。
石龟气负星文粲，林鸟声催草木鲜。

忽忆家乡思对镜，明晨霜鬓独凄然。

寥寥数笔，追忆了罗城拓荒的往事，总结了振兴合州的艰辛，抒发了思念亲人、慨叹人生的真情。

对于合州的岁月，他后来在《初至黄郡与友人书》中追怀感慨：“天下有极苦之地居之久而不为苦者，罗城合州是也。……合州人烟绝灭，水陆冲烦苦矣。仆则挑水运柴，主则读书饮酒。民间供应尽裁，上司殊求亦宽，往来仕客闻风

而叹息，以去夫役，因之无忧。在上则曰‘清操毅敏’，又曰‘刻苦矫厉’。为良吏，美之又加悲焉。悯其穷也，在下乖涕号泣，无复官民礼。此居极苦之地而不为苦者也。”

正由于他把民众的温饱饥寒放在极重要的位置，而把朝廷派下来的“皇差”视为“劳民伤财”，并且不顾个人的进退荣辱，上书直陈，尽瘁为民，一心为公，在合州，民众才与他鱼水相依，为他调任后立生祠永志感念，《合州志·宦绩》中对他写下了很高的评价：“于成龙……居官清正廉明，多善政，州人号于青天。”

三、湖北呕血抚民

康熙八年(1669年)，52岁的于成龙因功绩显著迁黄州府同知，分镇岐亭。此后的八年间，他在湖北先后任武昌府知府、黄州府知府、江防道台，官阶日升，但他始终不慕荣利，心如止水，有词作《满庭芳》为证：

脱却蛮烟，奔离蜀道，三年又至光黄。生来命薄，才力比谁强？眼见此身已老，消磨了、多少疏狂。百年里，有几人跳出傀儡逢场。思量还故里，算瓢陋巷，澹泊何妨？任随缘过日，说甚彭殇幸遇。杏花赤壁访古迹，感慨悲伤。寻雨池，半豆荒草，一望白云乡。

正由于无欲则刚，他才敢在任屡屡直谏上司，力除弊政，为民请命，广施惠政。

岐亭即如今的湖北麻城市岐亭镇，扼守麻城西南大门，依九螺山，傍举河，为清初黄州府统辖八县的军事衙门。这里民风强悍，盗贼猖獗，以至官府竟不敢过问。于成龙到任后，亦小心谨慎，处事如履薄冰，尽心从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调查分析，他终于查到了扰乱治安的“突破口”——捕役汤卷。于成龙发现，此人十有八九与盗犯有牵连。于是，他设计宴请汤卷，借两人对酌之机得到了岐亭盗犯名册。之后，他又扮作农夫微服私访，掌握实据，最终一举将9名重犯逮捕归案，并发出公告：“有能保后不为盗者，本府当场释放。然保释者若再犯，保结人连坐，一同治罪。”结果只有两名重犯被保释。其余凶犯依法处死，活埋在大路之侧，并在坟前插一木牌，上书“黄州府二府于成龙瘗盗处”。至此，其余小贼无不闻风丧胆，称于成长为“于活埋”，纷纷敛迹逃匿。间或有胆敢再犯者，也难逃于成龙布下的法网。岐亭自此盗息民安。

不过，于成龙也并不是单凭着破案的明察和决断而平息盗风的。因为他对“盗何以为盗”的根本原因，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。早在罗城《对金抚台问地方事宜》中，他就曾言：“盗即民也，民虽无知，决不乐于为盗，必为饥寒刑罚逼之而为盗也。”他认为，责在有司。官员必须“清净寡欲，倡行德政，以端风俗”。为此，他首先在作风上正己。他生活上一贯布衣疏食，淡泊自甘，有一首《百字令》，真实地描绘了他所居府衙之简陋破败：“楚天和霭，忽风狂云黯，霎时雨溅入篷窗，喷碎玉，湿透竹，穹珠滴，龟怒龙吟，雷轰电掣，永夜无休息。挑灯倚枕，危墙只恐吹揭……”一次，长子廷翼前往岐亭

探父，返乡前父亲只给了他半只鸭子供途中充饥——不是父亲吝啬，而是合府上下只有一只鸭而已！为此，于成龙又得了一个绰号，曰“于半鸭”。直至以清廉著称于朝野，人称其为‘于半鸭’。在正己的同时，他大力推行德政，以正民风。上任之初，他得知宋代贤达陈季常晚年隐居歧亭杏花村，死后就安葬在杏花村的小山凹中，便特意修建了一所宋贤祠，亲笔题写匾额“辉光照国”，又亲手栽植桂树两棵。后世宋贤祠遭损毁，匾也被砸，只有咸丰年间后人重修宋贤祠时刻立的“宋贤祠忠节祠碑记”石碑仍保存完好。这篇碑记记载着于成龙当年讲学于宋贤祠，推崇宋贤，以善风化的感人事迹，供人瞻仰。城之大有其人，所以去外求之。其人之重者，

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黄州大旱，于成龙提出“勿使一民饿死”的口号，开官仓赈济，劝富户解囊。他自己甚至卖掉充当官轿的唯一一匹骡子，售得纹银十两，连同本人俸银，统统买米救济灾民，而自己却以糠粥为食。当时有民谣传唱道：“要学于公清廉，先吃于公糠粥。”“要得清廉分数足，难学于公吃糠粥。”从此，“于糠粥”的绰号伴随了他的一生。由于清廉的风范，百姓因此而尊崇他，同僚因此而敬重他。在歧亭期间，于成龙第二次被举为卓异。城之大有其人，所以去外求之。其人之重者，

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于成龙迁任武昌知府。这一年，三藩之一、镇守云南握有重兵的吴三桂叛清，自称周王，连连举兵攻陷湖南数州县。这样一来，湖北顿时成为前线，战云密布，民心惶惶，而大量的军需供应、水陆运输、役夫征集等事务，统统压在地方县府头上。于成龙不愿给已受战乱之苦的百姓雪上加霜，便多次上书，请求宽纾民力，并建议：以

捐输运价代替征调运夫，停止额外采购军粮，减少召募枪手的定额，部分军用器具，包括锅、桶、槽、铡等物，甘愿自任其劳，委托下属购买木料、铁器，自行制造，不再向民众摊派。

湖北巡抚张朝珍对当时的局势一清二楚，对于成龙的见解颇为赏识，每有兵事，必招这位部下共同谋议，谨慎地对付吴三桂叛军，力求不出一点纰漏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些事情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
三月下旬，大批清军南下，与长沙叛军交锋。于成龙奉命前往咸宁蒲圻造桥，以渡大军。四月初，在当地官民的全力支持下，咸宁河木桥建成了，然而修建蒲圻河桥时却遇到了麻烦。当时由于战乱，蒲圻县城已是人烟稀少，招抚民工谈何容易？又正值梅雨季节，河水暴涨，根本无法打桩造桥，无奈之中只得退而求其次——修造浮桥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连日大雨如注，难以连舟成桥。这边清军渡不了河，那边吴三桂却在死拼的同时，在清军后方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，到处散布类似委任状的“伪札”，煽动乡民反清复明，致使百姓纷纷揭竿而起，投向叛军。张朝珍急于应战，打算出兵镇压，于成龙斟酌缓急，深谋远虑，加以劝阻，在呈文中指出：“民乱应防患于未然，现在既已反乱，以抚民之心为上策。为不使百姓生疑，抚民时不可带众多兵马，同时应广收逃兵，勿使其散布流言，勿使其无路可走而加入乱民。”张朝珍听纳了于成龙的建议，才使局面很快得以控制。

到了五月，大雨仍不止，洪水滔天，激浪奔涌，尽管于成龙再三亲督加固木桥，咸宁桥还是被洪水冲没了。大队清军被困河岸，而蒲圻桥又根本无法修建。为此，于成龙被革了